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20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

9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20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

9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孙 犀

我的自传	孙 犀 (2)
编辑笔记(续一)	
——关于编辑和投稿	孙 犀 (4)
谈校对工作	孙 犀 (10)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孙 犀 (13)
我和《文艺周刊》	孙 犀 (20)
与《南开文艺》编辑的谈话	孙 犀 (22)
文学期刊的封面	孙 犀 (25)
孙犁的编辑生涯	管 蠡 (27)
老编辑家孙犁印象记	克 明 (31)
孙犁编辑思想论略	张宗友 (36)
忆前辈孙犁	宋曙光 (45)
为通俗化和大众化而努力	
——记孙犁与《平原杂志》	杨振喜 (56)
报纸副刊如何办出特色	
——孙犁报纸副刊编辑研究	李九伟 (63)
存目	(67)

张光年

一年来之中国出版界	张光年(71)
光未然传略	刘可兴(74)
张光年与风暴过后的《人民文学》	周 明(82)
饯腊催耕	
——大地回春前后的张光年	刘锡诚(92)
悼念老主编光年同志	颜振奋(142)
跟光年同志学做编辑	吴泰昌(147)
光未然——活得充实走得利落	王 蒙(150)
存目	(153)

陈翰伯

关于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情况给胡耀邦同志的紧急报告	陈翰伯(157)
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陈翰伯(165)
在敌人心脏地区办报	
——陈翰伯在《联合晚报》	姚芳藻(169)
青春办报 翰首出书	
——记陈翰伯的编辑生涯	高 嵩(177)
陈翰伯和《少年百科丛书》	遇衍滨(196)
记陈翰伯在出版界三十年	赵晓恩(203)
陈翰伯同志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贡献	宋木文(211)
忆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时期	汪家熔(227)
为了辞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深切怀念陈翰伯同志	方厚枢(246)
存目	(259)

王子野

同编辑谈读书	王子野(262)
出版学在众多学科中应占有一席位置	王子野(267)
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	王子野(271)
严谨、勤奋、朴实无华	
——忆父亲王子野	陈光(273)
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	吴道弘(276)
出版界的元老 爱惜人才的长者	
——怀念老社长王子野	张惠卿(285)
敬悼子野同志	邵益文(289)
怀念子野	姜维朴(291)
虚怀若谷 高山景行	
——怀念王子野同志	曹治雄(294)
不尽的思念	
——遥寄子野同志	郭因(296)
胡适与亚东本古典小说	
——王子野同志逝世百日祭	钟叔河(303)
新闻出版战线上的老将、学者——王子野	蒋曙晨(308)
存目	(311)

秦兆阳

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	(314)
关于父亲两封信的说明	秦晴(318)
编辑的苦与乐	秦兆阳(320)
遥寄蓝天	
——忆父亲秦兆阳	秦万里(322)
秦兆阳印象	孟伟哉(327)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 秦兆阳谈文学编辑工作 何启治(334)
- 永远纪念我们的主编兆阳同志 《当代》编辑部(351)
- 老秦的遗言 韦君宜(353)
- 秋天的怀念
- 秦兆阳同志在我心中 崔道怡(355)
- 唯向秋风恸
- 悼恩师秦兆阳 叶文玲(362)
- 耿介一世人
- 悼念秦兆阳 陆 地(365)
- 慈祥的火——秦兆阳 蒋子龙(371)
- 化作春泥更护花
- 怀念秦兆阳同志 程树榛(376)
- 磨稿亿万字 多少悲欢泪
- 缅怀秦兆阳先生 李 频(384)
- 脚踏现实
- 一生敬业而正直的秦兆阳 胡德培(392)
-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人
- 编辑家秦兆阳逝世十周年 杨春兰(400)
- 迟到的悼念
- 怀念秦兆阳老师 陈世旭(404)
- 存目 (412)

韦君宜

- 为人民当一名德才兼备的好编辑 韦君宜(415)
- 忆《文艺学习》 韦君宜(422)
- 编辑的忏悔 韦君宜(426)
- 我所认识的韦君宜同志 黄秋耘(429)

耕云播雨四十春

——韦君宜畅谈编辑的素质、修养、职责和作风

..... 何启治(436)

夕阳风采

——韦君宜素描 何启治(457)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 曾彦修(471)

我所了解的韦君宜和杨述 丁磬石(476)

韦君宜在“鲜花”中远行 吴学昭(487)

怀念韦君宜

——一个大写的人 盛禹九(496)

可敬的韦老太 吴道弘(510)

一曲歌终千绪绕

——悼念韦君宜同志 张 锯(514)

君宜同志,您走好! 谢明清(517)

我的“伯乐”韦君宜 冯骥才(524)

存目 (529)

孙 犁

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原名孙树勋。早年在保定育德中学上学，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在读书期间，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发表作品。中学毕业后，从事小学教学工作。1937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冀中区编



辑了革命诗抄《海燕之歌》。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工作，并编辑文艺刊物《文艺通讯》。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编辑工作并从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1946年编辑了通俗文化杂志《平原杂志》。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长期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孙犁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荷花淀》、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由于他的小说多

以反映白洋淀地区的生活为主要内容，成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

孙犁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为解放区的文学和天津市的文艺繁荣、培养文艺新人特别是工人作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我国文艺副刊编辑的一个典范。

我的自传

孙 犁

1913年我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幼年就在这里度过。12岁，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安国县离我的家乡有60里路，这是一个以中草药聚散地而闻名全国的城市，相当繁华热闹。在这里，我开始接触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例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其中有鲁迅、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我开始阅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杂志。

14岁，我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北方，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私立中学，它以办过勤工俭学的留法准备班，培训了不少人材著名。在初中读书期间，我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在高中时，我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和曹靖华翻译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我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并开始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高中毕业后，我无力升学，父亲供给我上中学，原是希望我毕业后考邮政局，结果未得如愿。我在北平流浪着，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听讲，继续投稿，但很少被选用。为了生活，我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

1936年的暑假后，我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在这个学校，我从上海邮购革命的文艺书刊，继续进修，并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

1937年冬季，我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冀中区，我编了一本革命诗人的诗抄叫做《海燕之歌》，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铅印出版。在《红星》杂志上，我发表了长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在《冀中导报》的副刊上，发表《鲁迅论》。1938年秋季，我在冀中军区办的抗战学院当教官，教《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

1939年我调到晋察冀边区所在地——阜平，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在那里，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阅读的小册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我做通讯指导工作，并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它是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在上面，我发表了《一天的工作》和《识字班》等作品。

此后，我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我曾回冀中区一次，在那里，我帮助编辑了《冀中一日》，并以编辑心得写成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

1944年，我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我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作品。

1945年，日本投降，我回到冀中，下乡从事写作，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我写了《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1949年进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在这里，我写了《风云初记》和《村歌》等作品。

1956年，我身体开始不好，写作就少了。

我的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诗集《白洋淀之曲》，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铁木前传》，论文《文学短论》、《文艺学习》，选集《村歌》，儿童读物《少年鲁迅读

本》、《鲁迅、鲁迅的故事》等。

1978年8月23日于天津

原载《孙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

编辑笔记(续一)

——关于编辑和投稿

孙 犁

编 辑

作为编辑，他的工作对象就是稿件。编辑和投稿者——作者的关系，应该是文字之交，双方面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稿件，而不应该是其他。既办刊物，就需要稿件。因此，对于投寄来的稿件，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投稿，就希望刊物采纳刊登，至少希望得到编辑的意见，求得长进，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关系，前些年，叫“四人帮”给搅乱了。最初，以“工农兵占领文艺阵地”为旗号，一个刊物的编辑部，整天座无虚席，烟雾弥漫，高谈阔论，门庭若市。加上不停的电话铃响，送往迎来的客气话套，编辑是没法坐下来安静看稿的。

来客所谈，并非尽是关于稿件的问题，或者，简单地谈几句稿件的问题，就转到了别的方面：如探听小道消息，市场情况，有什么新产品出售，或根据来客的职业，问编辑们要捎带什么物品等等。这样，编辑部里充满了交易所的气氛，美其名曰：开门办报，接近群众。

而且不断有商品出现在编辑部里面，有时是处理牙膏，有时是

妇女头巾，有时是裤衩。都是由各行各业的作者带来，编辑们围上去，你挑我拣，由一人负责收款。每买一次货物，半天的时间，群情振奋，不能工作。

毋庸讳言，有些编辑同志，业务水平不能说是很高。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同志，除去加强政治学习，应急起直追地学习业务。编辑的业务学习，方面很广。编辑知道的东西，应该比作者要多些。要加深文字修养。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一个杂家。

要熟悉社会各行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要熟悉农村、工厂、部队，包括种地、生产、作战的具体知识。不知道这些，就没法改稿，或改稿出笑话。

要参考前人编辑刊物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经验。当务之急，是先学习鲁迅主持编辑的刊物，如《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应该学学他在每期刊物后面所写的“后记”。从鲁迅编辑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对艺术的要求。

对待作者要亲切也要严肃。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们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当。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无。（非指意识形态，指生活资料。）

对待投稿者不摆架子，不板面孔，但也不因为他有所呈献而青眼相加。编辑是一种工作职称，目前“张编辑”、“李编辑”的称呼，不太妥当。

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文通顺，使作者心服。

敝帚自珍，无论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

疼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

（历史经验：在30年代，《文学》编辑傅东华删了周文的小说，删的太多而不妥，周文找上门去，时称“盘肠大战”事件。）

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有事写信商量。这样互不干扰日常工作，保持编辑部正常秩序。鲁迅说，他从来也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来。

改错稿举例：

（一）把原来字数相当的一副对联，改成了一句长、一句短，这是不对的，因对联不是标语。

（二）把一个解放区作者自传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错改为“回到北平”，这很可能是因为字体易混排错了，编辑没有看出。而当时北平为敌占区，如以后有人根据此文，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例（一）为常识欠缺；例（二）为粗心大意。

例（一）是编辑只求文字中内容无错误，忘记了这是一副对联。例（二）是编辑对历史背景不大了然，看到主人公从张家口出发，“经过宣化”，就以为他一定是坐火车到北平去了。其实主人公是坐火车到宣化，然后步行，经涿鹿、易县回到冀中。

编辑有责任把文章中的标点弄好。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对标点，也不太认真、讲求。标点很重要。

错误标点举例：

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中，有一段话为：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

编辑标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这成何话语。

不为改稿而改稿，即不是为了叫组长看自己的工作成绩，而故意把稿子大加删改，涂抹很多。

对稿件严肃认真，就是尊重作者，其他种种，都是无谓的客气。如发表作品，不要有恩赐观点或投机心理。能做到坚持原则，不做风派人物，那就更可贵了。

刊物要往小而精里办，不往大而滥里办。这不只是为了节省财、物、人三力，主要是为了提高创作的水平。编辑选登稿件越严格，应之而来的一定是创作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降低创作的水平。

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

投 稿

有志于文学创作，先从思想、生活、语言等方面，加强修养，但也需要投稿。刊物之于作者，如舞台之于演员，球场之于运动员，是必要的练习场所，必须上去。但要有充分的准备。

在学校，可在课堂上认真作文。经过老师评改，好的可在校刊上投稿。在工厂、农村，可在墙报上发表。再有进步，可在地方报刊投稿。不要一来就在大刊物投稿。这倒不是说客大压店，或店大压客。大刊物稿子太多。在地方报刊投稿，容易被选刊，可以得到鼓励。

投稿前，要经常阅读一些报刊，看看它的水平、内容、要求。稿子一定要抄写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就像在考场写卷子一样，字体不清楚是很吃亏的。常常发现，稿子写得乱，内容也就不好。内容好的，稿子一般抄写得也工整。

投稿，最好是按照邮局规章，把稿子寄到编辑部，下面用清楚字体注明姓名地址，以便联系。有些人名字写得很潦草，编辑认不出来，大家传阅，猜想，这是很不好的。

有人好带着稿子跑到编辑部，请编辑当面指点。这种办法并

不好，临时仓促地看，不一定就能提出切实的意见。有的人未进编辑部之前，先买一盒好烟，进去了，张编辑、李编辑都敬一支，这种做法也不好。至于带上本厂的产品，给编辑以各种生活的方便，都与提高稿子质量无关，甚至有害。

有的人，和编辑们混熟了，没有稿子，也往编辑部跑，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无所不谈。这种好跑编辑部的人，恕我直言，常常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或原来写得还不错，后来反而退步了。

登门拜访成名的作家，或写信提出很多创作上的问题求教，我想收获也不会很大的。

初学写作，都希望有名师指点。但创作这一行，名师所能告诉给我们的，也不过是一些规律性的话，如劝我们深入生活，多读书，多积累词汇等等。名师不能把生活、思想感情、语言技巧塞到我们作品中。再说，作家也是新陈代谢的，后来居上。我们只能在前人留下的遗产中，吸取营养，接受经验。成功之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去。

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只有埋头苦干，坚持不懈，才有收获。希图捷径，是错误的。别人的帮助、提携，也是有限的。有这些时间，或深入生活，或熟悉人物，或汇集语言，或阅读作品，对创作都会更有益些。

至于专好打听文坛花絮、作家生活，拨弄是非，散布流言，那已经是进入邪僻路径，更应该警惕。

古今中外，文坛从来被认为是个名利角逐的场所。“四人帮”更把它弄得污秽不堪。自从文痞姚文元以棍棒起家，平步青云，内居清要，外掌文权，声势显赫，俨然权威，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浅见势利之徒的心热眼红。以为文艺和文艺批评这种意识形态，大有可为，一棍如果打中，即使成不了姚文元，也是一本万利，鸡犬飞升的腾达捷径。流毒很深很广。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把它廓清，培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这需要好的土壤，好的水源，精心

的耕作，主要是靠作者自己刻苦努力。老一辈作家，主要是用他们的好作品，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帮助新一代。

初学写作，最好是写你所熟知的，有亲身体会的事，要写短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写好了抄写清楚，先请老师看，再征求一些群众的意见，修改得满意之后，再寄给报刊。要持认真的态度，不抱侥幸的心理。稿件如果被退回来，也不要灰心，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稿件的被采用或被退还，都是正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稿子退回来，对初学者来说，自然是质量较差的可能性多些。但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稿子不用，常常有多种情况，有时是不适合刊物当前的要求，这叫没赶上时候；有时是编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这叫没遇见伯乐。如果自己有信心，过一个时期或另投他处，稿子终归有出路。

旧社会投稿是很困难的，那时刊物很少，又大都是同人刊物，不重视外稿。但就是那样，也不是所有的人材，所有的好作品，都被埋没了。现在我们有这样多的报刊杂志，又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才能与努力的成果，更不会被无端埋没。但不能因为条件好了，饭容易到口了，就马虎从事，那样可就成功不易了。

在学校作文，是作业，可以模拟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爱好的语句在自己的文章中。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的毛病。一时写不出写不好，慢慢练习就是了。因为一旦犯了这种毛病，被人揭发，就会一蹶不振，名誉扫地。

（历史经验：30年代有一个昙花般的作家叫穆时英。他在文坛出现，最初好像一颗明亮的星。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现代》，在画页上刊登了他的半身相片。

那时候，日本以翻译外国作品的快速著名，从日文重译，中国当时也能很快读到一些新的文艺理论和作品。日本那时有些作家在模仿外国文学的新流派，例如什么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中国就

连接翻译了他的几篇小说。

穆时英最初是模仿日本的新流派，他马上红了起来。许多刊物向他拉稿，他供不应求，于是从模仿，一落而为抄袭。即从日文翻译，当成他的“创作”发表。不久被人揭发。旧社会对这种行为看得很严重，于是这颗新星迅速陨落，再也没有出过面，不知干什么去了。)

1978年4月30日

选自《孙犁文集》第5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

谈校对工作

孙 犁

我国的文化，优良的传统之一，就是重视书籍、报刊的校对工作。凡是认真读书的人，有事业心的出版家，有责任心的编辑人员，都重视校对工作。因为，有好文章，固然是第一义，但如果没有认真的校对，好文章也会变为不好的文章，使人读起来别扭，甚至难以卒读。至于写文章的人，当然就更注意校对了，因为这一工作的负责与否，直接关系到他的文章的社会效果。

在我国，历代的读书人，都重视书籍的版本，校讎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

在古代，校书的人，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一般说，校书的人，比起写书的人，知道的还要多些。有些青年作者，要出版著作，都是请先辈校正，并列于书前。鲁迅先生曾为不少青年作家校正文稿和出版物，他用的名称叫“校字”。

古代的书，抄写或是刻版，都是很困难的。书的印数和印出的时间，都受到限制，流传不广。越是如此，出版者的校对工作越是